

· 江南文化拾萃 ·

高子水居：聆听先哲的智慧心语

□汪春勃

1598年，辞官归里的高攀龙，在东漆湖（今名五里湖、蠡湖）的小岛上构建水居，名为可楼，取无所不可之义。他在《水居记》一文中对他的“别墅”有精彩描述：“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赢一以为广，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谓军将、漆塘渚山也。主人即洲作居，以水为垣，豁然四达。主人偃息其中，以水为娱，泊然自得……”

家住无锡城中水阙巷（即今南禅寺地铁站旁的水曲巷小区）的高攀龙，不时坐“私家船”经环城河、梁溪河、骂蠡港到可楼静坐思考。“携一二童子相羊湖上，动以旬月计。同志如吴子往、归季思（归有光之子）来访，相与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来复’之义，作复七规划”。

1626年，高攀龙因受魏忠贤宦党迫害而自尽，两年后即得以平反。清朝替代明朝后，高攀龙仍为士林所敬重。他的水居常让文人骚客触景伤怀。康熙时无锡文

人王灏来到水居，处处感念先贤的事迹行述，产生一种向往先贤的感动、仿效先贤行事的愿望，作诗云：登怀忆往迹，旷望悦幽心。群峰散平湖，空翠来苍岑。伊人虽绵邈，虚室悬铭箴。（《高忠宪公水居》），全诗贯穿作者对高攀龙思，想理念的无限敬仰。乾隆时国子生黄世则写下了《高忠宪公可楼用韵》：“读书何处访遗踪，短棹遥牵露草丛。半亩宫开山四面，三间楼占水当中。清流祸且同元祐，点将编成数钜公。薄暮渔村一声笛，白蘋红蓼起悲风。”

康熙时的《无锡县志》中，水居被列入古迹。雍正初修之。嘉庆八年，秦瀛又修之。以后又沦为废墟，片瓦不存。太平天国占据南京，无锡岌岌可危之时，为弘扬高攀龙的气节，地方绅士又募资在1857年重修水居，1860年无锡城陷，水居毁坏。

1894年，由金匱知县王念祖与地方名流薛福成、薛福祈、许珏、廉泉、裘廷梁捐资，秀才顾典书主持工程，加以修复。身在异国

的薛福成怀着对先贤的景仰，写下了《修复高子水居记》一文。重建的水居计平房三楹，书楼一盛，1919年1月24日失于火，化为灰烬。

1930年，在绅商高映川的主持下，重修已毁坏的水居，耗资6000余元，其中“高氏任十之三，出于邑人捐助者十之七”。华屋落成，吴稚晖先生题篆文额，文曰“心水双清”，9月5日举行落成典礼，参加者有县长潘忠甲等政要；有地方著名绅商荣德生、荣鄂生、薛明剑、王心如等。公祭仪式主祭杨筱荔，司赞王祺脚，读祝邹同一，礼生高涵叔、高直云。祝文中写道：……先生之学，追杨瀚米。先生之友，推归与吴。湖光山色，风月随书……

水居旧筑围墙，湖光山色，室中障不可见，而新居则高爽轩朗，面湖处围廊如画。远望湖中，别具丘壑，有谓风景实胜于蠡园者。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高子水居又被损毁。新中国成立后，高攀龙后裔曾在水居遗址树立一块碑以示纪念。1970年，推

广围湖造田，当地在东蠡湖北侧鱼池头西围成鱼池头圩，人文景点“高子水居”遗址湮没。

2006年，市政府在水居原址西侧200米处的一片沿湖鱼池（俗称“惠大池”）处重建了一个占地15公顷的“水居苑”公园，以全新的方式“复制”了高子水居。建了一座造型古雅的两层楼房，取名“五可楼”，以纪念旧时高子水居的“可楼”。“五可楼”旁建有一系列配套景观。

落款为“无锡市蠡湖地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2008年12月的介绍文字如是写道：

当年的高子水居位于今东蠡湖畔的鱼池头，高攀龙在此修习、著书、生活了27年之久。高攀龙倡导的“忧国、亲民、实学”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漫步在亲水绿景的水居苑，观览高攀龙纪念馆、高子石雕像、书画碑廊、诗文碑列、地标风帆、水榭栈道等景点，人文自然，交相辉映，不仅能够净滤喧嚣，更能让我们聆听到先哲的智慧心语。



幽 汤青 摄

· 门前风景 ·

舟来船往，方为水乡（下）

□周晓东

总有那一颗颗丰富而深邃的灵魂，他们的目光在太湖的最深处驻足、流连和徘徊。

时光回溯到北宋年间，一代干才能臣蒋之奇，与苏东坡、单锡两人，于嘉祐二年（1057）挽手同登进士。坡公是四川眉州人，蒋、单同为江苏宜兴人。天涯月白，松风竹炉，文人筋骨，江南特有肌理中的软绵与硬朗，一再成为三人精神地理上的宏阔背景。大约是第二次被贬之后，坡公终于在蒋、单二人的多次诚恳邀请下，开启了风尘仆仆的江南之行，目的地是宜兴。那应该是一个秋风飒飒、月明星稀的夜晚，江南博大的土地、阳羨温润的气场、太湖流连的烟波，向着坡公这位人间赤子一再展开那温暖的怀抱。青山隐隐，水波轻漾，渔火点点，苏、蒋、单三人泛舟太湖，品尝着鱼虾、野鸭、湖鹅。一时间，坡公感从中来，缕缕乡愁油然而起。

三人饮酒尝鲜，诗文唱和，暖暖的湖风，抚慰着坡公这颗饱经沧桑却依然昂扬的诗心。

在太湖，在桑垞，在善卷，在水上，在山中，在林间。坡公聆听着江南的葳葳私语、阳羨的如歌岁月，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初归阳

羨，子由从歙溪来，与邵梁父子单锡兄弟同游张公，惜别子由》：“鸭头春水绿如染，水面桃花弄春脸。袁翁送客水边行，沙村马蹄马帽点。昂头问客几时归，客道秋风黄叶飞。系马绿杨开口笑，傍山依约见斜晖。”文字和思想，几乎穿越了时光中所有的窟窿与裂缝，孤独与爱恨，渐渐汇聚成一条条漫漈的南方文学之河。

坡公此行，收获着他一生中 most 丰盛、最宝贵的财富，也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最值得珍视的决定：买田筑室，终老宜兴。坡公在宜兴有多处田产，其中有一处，就在太湖东岸的塘头村。“买田阳羨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一首《菩萨蛮·阳羨作》，将一个超然淡定、风华旷世的坡公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千百年以后，人们依然可以触摸到那颗跳动着的诗心。如果不是后来再度遭贬而离开，坡公是完全可以实现他终老阳羨的夙愿的。

坡公徜徉阳羨的时间，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一首《菩萨蛮·阳羨作》，一首《凤栖梧·荆溪写景》，一首《橘颂帖》，仅仅这三首

词，便足以奠定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江南宜兴作为精神之乡、文学之源的影像无比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如果一定要给阳羨梳理一种品格、追溯一条文脉、钩沉一个故乡，那么，高陞这个太湖之滨的南方小镇，这个与长江支流相依相偎的江南水乡，便在迢迢碧水和潋滟波光中悄然开启了文学的故土、教育的家乡。

历史也没有理由忘却一个人，他就是坡公的莫逆之交蒋之奇。当人们把目光长久地投注于太湖、投注于蒋之奇的时候，便会发现，蒋氏这个江南宜兴的望族，这个累代英才辈出、一族八代出了50多位进士的大家族，有多少人生的密码和教育的基因，深深地蕴藏在高陞的沃土和太湖的碧波之中。蒋之奇曾祖父蒋宏谨于23岁英年早逝，曾祖母史氏“誓不改嫁，寡居课子，嫠甚不堪，乃育鹅为生。朝纵去湖，暮扬竿为岸，则鹅群毕集”。史氏这位伟大的母亲，终生栖息在太湖之畔，养鹅为生，养育后代，课子读书，儒雅学风，惠及乡邻。其孙蒋堂率先脱颖而出，成为有宋以来宜兴第一位进士；曾孙蒋之奇又进士及第，官居枢密使；后人亦

得江南风气之先，学有成就者不乏其人。

关于太湖，蒋之奇还曾写下《题蒋庄养鹅墩》一诗，泛舟，养鹅，读书，人生的密码、教育的基因，也就在一首诗中不经意间和盘托出了。是的，鹅的文雅、鹅的气度、鹅的诗情，全都在那浮水的白毛中不动声色地释放，一种持之以恒的气度，经由太湖温润的土地，渐渐润泽每一位读书人，并由此坚定地贯穿其一生。

读书声，讲学声，劳作声，化作南方小镇高陞、江南水乡太湖上空一朵静谧的硕大的祥云，让人久久为之之神往……

太湖之水，潺潺流淌，也不知流了多少年。到了清末，南湖之高陞，早已有了一座南湖书院，民国时改为南湖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改称高陞小学。共和国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台湾中央大学校长虞兆中均毕业于南湖小学，并从这里走出，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代宗师。

蒋南翔、虞兆中，这是高陞的双子星座，也是坡公的化身。蒋氏家族的余韵。耕读传家、崇文尚德，让太湖在漫漫岁月中铸造出一个万世滋养、千秋功业的名字：高陞。

· 琐记 ·

读抄小集

□李中林

—

喜欢上写作以后，误把写作当作一种手艺了。各种手艺都有技巧，学手艺要拜师傅，技巧就由师傅传授。写作是没有师傅可拜的，写作的技巧，就只能自己寻找。

我先后买了《作家之门》《小说技巧》《散文技巧》《诗的技巧》等讲解写作技巧的书。花了不少时间，说不上是钻研，像是读考试课目一样认真在意，但是到自己动手写作时，所学的技巧，我全部忘记了。与学校老黄谈及此事，老黄说，掌握了各类文体的写作技巧，自己为何不去写作，还会写这一类教人写作技巧的书？老黄这话说了几十年，我一直记着。近读波兰作家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的书信：“要找如何写小说的教科书？我们这里可没有。在美国也许出版过此类书籍，不过书的价值如何，我们倒是可以大胆怀疑。因为作者要是真有靠谱的文学成功秘诀，他定是宁愿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不是靠写教科书来维持生计。这道理简单吗？简单。”这信是希姆博尔斯写给一位化名“寻觅者”的读者的，当时希姆博尔斯在一家报刊的《文学信札》专刊做编辑，老黄和希姆博尔斯说的是一个意思，老黄已经过世多年，眼前还浮现着他与我摇着手说这话的神态。

二

清雍正四年（1726），由于无锡县人口、赋税繁多，被分为无锡、金匱两县，西部为无锡县，东部为金匱县，两县共用1个县城。1912年（民国元年）撤废金匱县，两县合而为一，复称无锡县。无锡县分成无锡金匱两县时，县间分界线，恰巧把长安街道一分为二。两县以河桥为界，桥东归金匱县，称长治镇，桥西归无锡县，称久安镇。一镇分两县，也算中国历史上的治理奇观了。当时有人把长安街道的特点，编成顺口溜：“进浜十码头，一浜三环洞，一宅跨两县，九间一屋脊，三间一石沿。”其中“一宅跨两县”，听到过这样的故事：这院子里有人赌博，赌台半张放在金匱县境内，半张放在无锡县境内，无锡县公差来捉赌，赌台就移入金匱县；金匱县公差来捉赌，

赌台就移入无锡县。这故事有趣，猜想一定是好事者杜撰的。我妻子的祖父是八士桥乡下人，离长安镇很近，集镇上有亲戚朋友说起长安镇，老人就会背起这顺口溜。我也听人背诵过一两次，因这顺口溜好记，我也记住了。我的堂兄从洛社师范毕业后，分配在长安中心小学当老师，因他一心想继续升学，在1959年春天辞去了教职。他去长安小学搬取行李回家时，叫上了我。我们在祝塘坐了轮船，记得轮船临近长安镇时，岸高河深，九曲十八弯，十分狭窄，石桥桥洞仅能过一只船。过桥前，水手会大声警告，别把手伸出窗外。因为不久前有乘客在船过桥时，不小心把手放在船沿，过桥时，船沿和桥洞石壁相撞，断了几根手指。

三

写人，真实地写此人的特征，特别是面部特征，一定会很费斟酌。不费斟酌的如天庭饱满、地角丰隆、大眼睛、目光炯炯之类，写了谁见谁喜。费斟酌的是，特征是真正的特征，但这个特征说出来会伤人，一般写人，会伤人的特征也就避开了。周作人《怀废名》中写废名：“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废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写废名额骨头像螳螂，就是说废名的额骨头与螳螂一模一样，一般人也不能真的这样写。我想像废名这样的人，读了一定笑着说：这老家伙说得真灵。约瑟夫·布罗茨基与所罗门·沃尔科夫谈话时，说到美国诗人奥登，沃尔科夫想多知道一点奥登，他请布罗茨基描述一下奥登的特征。布罗茨基说：“人们常拿他与地图相比较。实际上，他的双眼中间很像地图。它被四面八方的皱纹分隔成这样，以至奥登的脸令我有点想起蜥蜴或龟的表皮。”沃尔科夫接着说：“斯特拉文斯基抱怨，为了看清楚奥登是什么模样，就得熨平他的脸。亨利·摩尔则恰好相反，赞叹说：‘深深的犁沟，有似横贯田野的犁沟。’奥登本人则幽默地将自己的脸比拟为遭雨淋的结婚大蛋糕。”布罗茨基赞叹他的脸是惊人的，说如果他能为自己挑脸孔的话，在奥登和贝克特之间挑选，他说：“我宁愿挑奥登。”

□立 群

重读百年前的法国小说

法国北方诺曼底地区诚实的农民奥士高纳大爷，在赶集的路上捡了一条绳子，却被冤家诬告为捡了一个皮夹子，于是引起了一场官司。事实真相大白后，他四处去解说，不但无人听，反而受到众人的奚落，以致忧郁而死。这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绳子》中写的故事。

小说写于1883年，故事发生在法国。在当今读来，我们仍可以清晰感受到作品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害死人”的深刻讽刺。

作为当地公证人的镇长，显然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集中代表。他在听信了马具皮件商玛朗丹的一面之词后，就简单粗暴而顽固不化地认定奥士高纳大爷捡到皮夹子的事实。于是，面对奥士高纳被“吓呆”“又气又怕”“气得满脸通红”等表现，他丝毫不改先入为主的错误的主观臆断，即便是面对奥士高纳掏出那段绳子，举起手以名誉起誓，并强烈要求“用灵魂和我灵魂的得救再起一遍誓”的抗议，他仍然固执己见，没有还奥士高纳清白。当然，从小说写作的角度来说，其精彩处就在寓恰当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于恰到好处的情节、细节设计之中，这就让这一段公案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坚实基础，也让矛盾得到充分发展，错误地听信一面之词就给奥士高纳带上了嫌疑犯的帽子，而且始终坚持错误判断不作改变，这种只看事物现象而不分析其本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是镇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害死人的第一步。

当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将捡到的皮夹子送还给了失主后，奥士高纳终于可以坦然荡涤地讲述他的遭遇，叙述他受到污蔑的经历了。这是故事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将故事推向一个新高潮：原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的奥士高纳，却发现大家在背后指责他是“骗子”，认为他和捡到皮夹子的人是同伙。面对众人的笑声，奥士高纳的抗议是如此的无力。因为镇长宁愿信任暗箭伤人的马具皮件商的一面之词，也不相信诚实的奥士高纳与确凿的人证和物证，加之周围的群众被反常的社会道德所蒙蔽，奥士高

纳力争洗冤屈的努力在众人的嘲弄中就显得苍白而无奈。面对不当舆论，镇长没有及时澄清并进一步出手引导舆论，而是一定程度上做了舆论的看客，他的不作为客观上成了扼杀奥士高纳的帮凶。这种整天高高在上脱离现实、不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实际矛盾并有效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表现，是镇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害死人的第二步。

面对在泥潭里苦苦挣扎的奥士高纳，镇长不但没有及时站出来为他作一点澄清，哪怕“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捡到皮夹子并把皮夹连同里面装的东西一齐送还的消息传到了四乡”，镇长老爷还是定力十足地保持沉默。按照镇长自己的说法：这个案子要报告检察院，听候命令再做处理。直到最后，镇长也没有为奥士高纳带来审判结果，这样的“糊涂镇长乱判糊涂案”，作为公证人，镇长有失公正；面对辖区内百姓的困苦，他无动于衷，冷漠无情。这种缺乏责任心、置百姓利益于不顾的不作为的表现，是镇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害死人的第三步。

有评论说，造成奥士高纳悲愤而死的直接原因，是十九世纪后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堕落，愚昧的偏见和可怕的习惯势力。当时法国社会道德急剧败坏，诚实厚道、纯朴善良反而被看作违反常规。这就在奥士高纳面前筑起了一座高高的道德之墙，最终熄灭了他的生命之火。

我认为，小说中奉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不是镇长一个人，对此，作者是有所铺垫的，那个宣读公告时“胡乱地读着破句”的差役，还有照本宣科的宪兵班长，就是不起眼的隐笔。奥士高纳后来趁着赶集的机会也找了很多 people 作解释，但唯独没有找镇长。临终前，他念叨的人却只有镇长：“一根绳子……一根绳子……瞧，就在这儿呢，镇长先生。”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对镇长的诅咒，而且是对以镇长为代表的奉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当时法国官僚体系的诅咒。

重读这篇一百多年前法国人写的小说，于当今也颇有意义。